

社会流动与共同富裕

——以青年外卖骑手为例

高文珺

【摘要】促进社会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本研究以青年外卖骑手为例，分析现实社会流动和社会流动感知如何在环境和心态层面有助于迈向共同富裕。文章通过对“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中6196份青年外卖骑手数据的分析发现，青年外卖骑手经历了代际间的教育流动和代内的职业流动与地域流动，并且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为其带来收入增加的机会。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感知会增强青年外卖骑手对职业发展的信心、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积极的社会地位认同。因此，从多方面促进社会流动，为青年人营造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两方面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键词】青年外卖骑手 社会流动 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高文珺，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2) 07-124-16

一、引言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促进社会流动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

^① 参见蔡昉《“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北京日报》2021年11月29日。

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①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强调“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② 一个社会具有社会流动的活力，一方面体现在制度和环境能够促进现实的社会流动，让人人都有勤劳致富的机会和发展环境，这可理解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社会环境基础；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们对社会阶层流动可能性的感知，对阶层上升的积极感知可增强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成为奋斗的动力，这可理解为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社会心态基础。

本研究将以青年外卖骑手为例，分析现实社会流动和社会流动感知在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方面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外卖骑手，又名网约配送员，是伴随信息技术和平台经济迅速发展而生的新型职业的代表，成为很多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更有调查显示骑手从业者有八成来自农村，^③ 是农村青年从事的比较多的一种非农就业工作。这也让很多骑手对社会流动有更为深切的体验。本研究将以青年外卖骑手为例，具体分析现实的社会流动轨迹与其收入的关系，以及主观社会流动感知是否影响他们的发展信心和城市融入。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从社会流动理解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基础

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是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共同致富的普遍富裕。^④ 共建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⑤ 而要形成一个共建格局，就要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与生产率、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建设等多方面因素都相关。其中一个要素就是要让劳动者可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由充分地流动迁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致富能力的不同获得相应的报酬，这种人力资源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21 年 11 月 8 日。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第 5 页。

③ 参见阿里研究院《2020 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http://it.people.com.cn/n1/2020/0421/c1009-31682438.html>，2022 年 1 月 6 日。

④ 参见董志勇、秦范《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和实践路径探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第 42 页。

⑤ 参见席恒、余澍《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第 65～73 页。

的充分流动可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由此,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社会环境基础。

另一个要素是培育积极向上、奋斗进取的社会心态,让劳动者成为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在实现个人财富提升的同时也获得精神富足。积极的社会流动感知可成为劳动者努力向上的一个动力,因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对阶层上升有信心,人们会更愿意投入奋斗之中,更多参与到共同富裕的共建格局之中。由此,积极的社会流动感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社会心态基础。

(二) 社会流动与共同富裕社会环境的相关研究

现有的一些理论和研究发现从不同角度为以上社会流动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论述提供了一定支持。比如,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流动可以通过改变每个人的收入状况而实现共同富裕。^①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流动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② 根据布尔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观点,阶层之间是可以在结构与建构、再生产的过程中进行跨越的。布尔迪厄用模态轨迹 (trajectoire modale) 来说明不同阶层个体成员向上或向下的流动轨迹。^③ 研究者总结这些轨迹包括向上流动的轨迹、向下流动的轨迹和摇摆不定的轨迹。

在社会流动性高的社会,人们能够获得较多的流动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往的研究显示,在流动率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和心态都会朝积极方向发展,比如代际职业阶层向上流动者的流动感知会更积极,公平感会更强;^④ 当户籍、职业和职务向上流动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更高;^⑤ 当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流动比较容易的时候,基尼系数会减小,贫富差距会缩小。^⑥

反之,当阶层固化、社会流动停滞的时候,贫富分化会日趋严重,发展

① 参见蔡昉 《“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北京日报》2021 年 11 月 29 日。

② 参见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

③ 参见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182~187 页。

④ 参见张顺、祝毅 《代际流动轨迹与分配公平感——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社会学评论》2021 年第 3 期,第 199~218 页。

⑤ 参见孙敬水、支帅帅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的微观证据》,《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62~77 页。

⑥ 参见 Alvaro Montenegro, Labor Mobility, Job Preferenc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ur*, Vol. 17 (1), 2010, pp. 93-102。

机会出现鸿沟,导致勤奋努力与成功之间不再对等。^① 如在社会流动程度低的时候,人们的社会公平感会降低;^② 向下社会流动会导致人们的幸福感下降。^③ 可见,社会流动会同时影响人们的财富积累和心态,无论是对实现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还是对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开放而有活力的社会流动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 社会流动感知与共同富裕社会心态的相关研究

社会流动对社会财富分配和心态的影响,不仅通过现实的流动来实现,还会通过主观的社会流动感知来实现。社会流动感知是指相信社会系统是灵活的、阶层可以跨越以及个体有机会进入不同的阶层。^④ 这种感知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低社会流动的感知使人们认为社会阶层不可跨越、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现状,这会让人更为消极,失去努力的动力。比如,有研究发现,当通过心理学实验操纵让人们认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很小时,人们就很少会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的信念,也会更加质疑结果的公平性。^⑤ 相反,如果人们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有信心,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公平感知,^⑥ 增强其幸福感,^⑦ 还能减少人们身处窘境时的负面情绪和对他人的敌意。^⑧ 由此可见,主观的社会流动感知会影响人们的奋斗信念和行为,而努力奋斗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行为基础。因此,高社会流动感知是有利于迈向共同富

- ① 参见[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页。
- ② 参见Nicholas Heiserman, Brent Simpson and Robb Willer, Judgments of Economic Fairness Are Based More on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than Perceived Inequality, *Socius*, Vol. 6 (1), 2020, pp. 1-12。
- ③ 参见鲁元平、张克中《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2014年第3期,第96~107页。
- ④ 参见Donald M. Taylor and Fathali Moghaddam, *Theorie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2nd ed.), New York: Praeger, 1994, pp. 119-138。
- ⑤ 参见Martin V. Day and Susan T. Fiske, Moving on Up? How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Affect Our Willingness to Defend the Syste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 8 (3), 2017, pp. 267-274。
- ⑥ 参见张衍《主客观地位与流动感知对公平感的影响与变化(2019—2020年)》,王俊秀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1~64页。
- ⑦ 参见陈丽君、胡晓慧、顾昕《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1期,第148~170、199~200页。
- ⑧ 参见Sagioglou Christina, Forstmann Matthies and Greitemeyer Tobias, Belief in Social Mobility Mitigates Hostility Resulting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Stand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45 (4), 2018, pp. 541-556。

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社会流动通过环境塑造和心态引导两个路径来影响共建格局的形成,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见图1)。本研究将在这一框架下以青年外卖骑手为例探讨社会流动与其收入获得、奋斗积极性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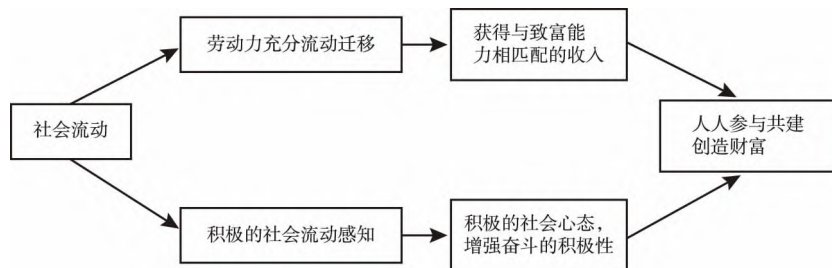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分析框架

三、数据与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0年的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该调查由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组织实施。调查对象为18~45岁的新职业青年,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本研究选用其中的青年外卖骑手样本,有效样本为6196个,其中男性占90.83%,女性占9.17%;平均年龄为29.92岁;农业户籍比例为70.31%,非农户籍比例为29.69%。

(二) 主要测量变量

客观社会流动的测量:本研究分析了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经验,包括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以及代内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教育流动是根据计算青年外卖骑手与其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异所得,分别记为“低于父母”、“与父母相同”和“高于父母”的三个流动情况。职业流动是比较青年外卖骑手当前工作与其上一份工作之间的流动情况,包括三种情况:一是首次就业从事骑手工作,二是从失业或下岗状态到从事骑手工作,三是从其他工作换为骑手工作。地域流动比较调查对象的家乡所属城市和当前城市的流动情况,并将城市类型按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和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做出从高到低三个层级的划分,由此将地域流动分为向下流动、平行流动和向上流动三种情况。

社会流动感知的测量:本研究还分析青年外卖骑手对社会流动活力的感知,而对阶层流动的信心可以作为衡量其社会流动强弱感知的重要指标。在

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调查对象对自己当前经济地位所属阶层的感知和对自己五年后所处阶层的感知,以10点量表计分,1分为“最底层”,10分为“最顶层”,计算五年后阶层感知和当前阶层感知的差值表示其阶层流动预期,负值记为“向下流动”,0分记为“平行流动”,正值记为“向上流动”。

四、研究发现

(一) 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特点

从青年外卖骑手代际间的教育流动特点看,青年外卖骑手与其父母相比,有更多机会接受较高的教育,受访骑手的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仅为5.00%,而其父母之中最高的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比例达到了24.81%;近一半的被访者接受了高中或职高教育(47.06%),而其父母一辈只有三成人有这样的机会(30.64%)。接受大专和本科高等教育的青年外卖骑手比例合计为23.95%,而其父母这一比例仅为6.65%。从教育流动方向看,在青年外卖骑手群体中,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比例平均达到了57.53%,平行流动的比例为33.17%,向下流动的比例为9.30%。

对比分析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青年外卖骑手代际间的教育流动情况,结果显示,农业户籍骑手无论是自身还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都要明显低于非农户籍的骑手,特别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农业户籍骑手的父母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累计为69.67%,而非农户籍骑手的父母的这一比例为46.55%;而骑手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非农户籍骑手接受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及以上)的人数比例(35.72%)要远高于农业户籍骑手(18.97%)。但两类骑手在代际间教育流动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农业户籍骑手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比例(58.54%)略高于非农户籍骑手(55.75%),但未达统计显著性;两者的教育代际平行流动比例(分别为32.24%和34.93%)和向下流动比例(分别为9.22%和9.32%)也无显著差异。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从事骑手职业的青年中,无论是持有农业户籍还是非农户籍,其获得代际间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概率都是接近的,只是在目前所达到的最高受教育水平上,农业户籍的骑手还是低于非农户籍的骑手。

对于青年外卖骑手的职业流动特点,本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在受访骑手中,大部分都有职业流动的经验,有85.87%的骑手是从其他职业转行从事骑手工作的,其之前所从事的职业以产业工人(28.26%)、商业服务人员(16.55%)和自由职业者(15.26%)居多,还有部分个体经营者(9.41%)、办事人员(7.99%)和少量的企事业单位管理者(3.25%)、专业技术人员(1.18%)等。有7.94%的人(之前处于失业或下岗状态)选择从事骑手工作;另有6.19%的人是以骑手为其首份职

业的。

从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青年外卖骑手的对比分析看,农业户籍的青年外卖骑手从其他职业流动到骑手职业的比例(87.01%)要高于非农户籍骑手(83.12%),而非农户籍骑手在初次工作或是从失业到再就业时选择骑手职业的比例会比农业户籍骑手高(在首次就业比例方面,非农户籍为8.05%,农业户籍为5.40%;在失业转骑手比例方面,非农户籍为8.84%,农业户籍为7.60%)。

对于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流动特点,本研究比较他们的家乡所属城市和其当前工作城市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青年外卖骑手中39.03%的人目前的工作地域是未流动状态,即在家乡工作。而对于存在地域流动的青年外卖骑手来说,流动轨迹多为地级市之间的平行流动,占比52.72%,其中大部分是一般地级市之间的流动(47.77%),一线城市和直辖市之间的流动(2.50%)和省会城市之间的流动(2.45%)比较少。还有16.33%的被访者是向上流动到发展机会比较多的大城市,从一般地级市流动到一线城市和直辖市(8.49%)或是省会城市(7.34%)的比例相当,但是从省会城市流向一线和直辖市的比例很少(0.50%)。地域上向下流动的青年外卖骑手占比很少,仅为1.92%,其中绝大部分是从省会城市流向其他地级城市(1.29%)。

(二) 青年外卖骑手的收入特点

本调查中青年外卖骑手的平均月收入为5079.57元,月收入中位数为5000元,收入分布比较集中,内部差异较小。而其中占据骑手主体的农业户籍青年外卖骑手的平均月收入为5149.45元,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①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4072元,可见,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从事骑手职业的月收入会普遍高于平均水平。

在本次调查中,还调查了其他新职业群体的就业情况,包括网络主播、公众号/微博等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员、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等。比较青年外卖骑手和这些新职业群体的收入发现,其他需要一定专业技能的新职业群体的平均月收入大多高于骑手(见表1),但是从平均值和中位数看,其他新职业群体收入分布相对分散,内部的收入差异较大,收入均衡性要低于骑手。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 2022年2月9日。国家统计局2008年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8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488个村22.6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表 1 青年外卖骑手与其他职业群体的收入对比 单位：元

职业	月收入平均值	月收入中位数
新职业青年调查		
青年外卖骑手	5079.57	5000.00
农业户籍青年外卖骑手	5149.45	5000.00
非农户籍青年外卖骑手	4947.31	5000.00
网络主播	6922.03	5000.00
公众号/微博等全媒体运营人员	5182.44	3000.00
网络文学写手	7084.18	5000.00
电子竞技员	4831.83	3000.00
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	7291.67	5000.00
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理人	7067.67	5000.00
总体对比		
SMS 2020		
青年非农就业 ^①	5169.79	4000.00
农业户籍青年非农就业	4371.30	4000.00
非农户籍青年非农就业	6360.93	4000.00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7649.35	6000.00
专业技术人员	6763.47	600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6032.35	4000.00
服务性工作人员	4296.95	4000.00
商业工作人员	6394.88	4000.00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985.34	2000.00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4754.33	4000.00
其他	4497.82	2000.00

①本文从 SMS 2020 中选取 18~45 周岁、从事非农工作的青年，总样本有 5819 人，其中农业户籍 3481 人，非农业户籍 2337 人，另有户籍不详 1 人未纳入分析。

与同年进行的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简称 SMS 2020）的青年数据进行比较，^① 总体上，本调查所得的青年外卖骑手平均月收入（5079.57 元）基本达到了 SMS 2020 所得的青年整体的非农就业收入的平均水平（5169.79 元）；因骑手主体为农业户籍青年，从事骑手工作的农业户籍青年的平均月收入（5149.45 元），要高于农业户籍青年非农就业收入的平均水平（4371.30 元）。再将骑手职业和传统的职业进行对比，青年外卖骑手的平均

① 中国社会心态调查（Social Mentality Survey, SM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年度调查。调查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采用分层抽样和 PPS 概率抽样，抽取 604 个区县的 314 个城镇社区和 290 个农村社区。2020 年调查有效问卷 10195 份，男性占比 43.3%，女性占比 56.7%，年龄在 18~70 岁之间，本文选取其中 18~45 岁的青年数据进行分析。

收入要高于一般的服务行业从业者、工人和农、林、牧、渔行业从业者，同时具有群体内部收入分布差异较小的特点。

总体而言，得益于近几年外卖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当前骑手在服务性行业中的收入相对比较高。对于进城工作的农业户籍青年而言，骑手是收入高于群体平均水平的一份非农工作。再加上骑手入行要求相对较低、灵活性较强等特点，吸引了一些青年从业者。前述分析还显示，很多骑手从业者是转行从事这一工作的，结合前述职业类型流动的具体情况和当前的收入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是从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转入收入相对较高的骑手职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骑手职业让一些青年更容易转入能增加收入的行业。

（三）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与收入

如前所述，社会流动可以改变每个人的收入状况，获得更多致富机会。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经验对其收入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为更准确地捕捉社会流动变量与收入之间的关联，本文采用协方差的形式，将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协变量，控制其对收入的影响；此外，由于外卖骑手的收入与工作时长关联紧密，本文也将平均每日工作时长作为协变量，以控制其影响。

首先，本研究通过协方差分析青年外卖骑手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与收入的关联，以代际间的教育流动类型为自变量，骑手工作的月收入为因变量，以前述人口学变量和平均每日工作时长作为协变量。结果显示，协变量中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每日工作时长与收入正相关，在控制这一影响后，当青年外卖骑手代际间教育呈向上流动趋势时，其收入会增加，具体是向下流动的骑手平均月收入为 4952.42 元，平行流动的骑手平均月收入为 5040.81 元；向上流动的青年外卖骑手平均月收入为 5131.86 元。但整体上，不同代际间的教育流动类型之间的收入差异并不显著（ $F = 0.08$, $p > 0.05$ ）。对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青年外卖骑手的对比分析也没有发现显著区别。这一结果表明，对于青年外卖骑手群体来说，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与其收入关联性不大。

其次，本研究分析青年外卖骑手的职业流动类型和收入的关联。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每日工作时长的影响之后，青年外卖骑手的职业流动类型与其收入存在明显关联（ $F = 6.20$, $p < 0.01$ ），从其他职业转行的骑手平均月收入最高，为 5129.19 元；首次就业的骑手平均月收入次之，为 4894.46 元；收入最低的是失业或下岗后再就业的骑手，为 4721.19 元。可能的原因是从其他行业转行的骑手已有一定工作经验，并且更可能是主动选择流动到工作待遇或工作灵活性更适于自己的骑手职业，工作热情更高；首次就业的骑手则可能因缺乏工作经验而影响收入；而失业或下岗后再就业的骑手更可能是被动选择了职业流动，工作认同

度较低,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表现和收入。为验证这一解释,本文进一步分析职业流动类型不同的青年外卖骑手对骑手工作的认同程度,结果显示,失业再做骑手的受访对象对骑手工作的认同率(83.75%)也要低于从其他工作转做骑手(87.33%)和首次就业做骑手(87.34%)的受访对象。

对比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青年外卖骑手,本研究发现骑手的职业流动类型和收入的关系因骑手户籍背景不同而呈现不同模式。在农业户籍青年外卖骑手中,从其他职业转行到骑手职业的受访对象平均月收入最高(5207.83元),因失业或下岗而转做骑手的受访对象收入次之(4841.12元),而刚工作就做骑手的受访对象平均月收入则最低(4688.60元)。这样的差异表明对于农业户籍骑手来说,其职业收入可能与其在城市的工作经验有关,前两者都曾做过其他工作,与进城就从事骑手工作的农村青年相比,城市融入度和适应性可能会更强。

对于非农户籍青年外卖骑手来说,则是首次就业做骑手的受访对象平均月收入最高(5272.73元),其次是从其他职业转行的骑手(4962.76元),而失业或下岗后再就业的骑手平均月收入则最低(4512.74元)。这一差异可能更多与工作匹配性有关,首次就业就选择骑手往往认同度较高,而转行的骑手因更多基于主动选择而有所准备,但失业或下岗后再就业的骑手往往是被选择,工作认同度和匹配性相对最差,因而影响了收入。

总体而言,青年外卖骑手从业者大多经历了职业类型的流动,从其他职业或是失业状态转入骑手行业,并且这种流动可能是基于这一行业收入较高、门槛较低而主动做出的选择,工作认同度更高。农业户籍骑手作为骑手从业者主体,在有其他行业工作经验基础之上,收入会比没有职业流动经验的骑手更多。

再次,本研究分析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流动和收入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流动类型与其收入存在明显关联($F = 64.41$, $p < 0.001$),从家乡所属城市向上流动到更大的省会或一线城市和直辖市工作的骑手,平均月收入最高(5917.49元),收入水平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从资源更多的城市向下流动到资源相对更少的城市的骑手(5239.50元),平行流动的骑手收入排在第三位(4990.56元),收入水平排在最后的是在家乡所属城市工作、没有发生地域流动的骑手(4818.44元)。这一结果表明,仅从收入角度,不考虑生活成本等问题,地区间的流动是有助于骑手的收入提升的。

而向下流动的青年外卖骑手收入之所以高于平行和不流动的骑手,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骑手放弃留在家乡所在的省会或一线城市和直辖市而选择流动到其他城市,认为这些城市有更符合其发展规划的机会,工作动力更强。为验证这一点,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城市流动类型不同的青年外卖骑手五年后的工作规划。结果发现,向下流动的骑手选择“现在工作不错,继续好好干”

或“虽然工作干得还不是很好，但是前途不错，会想办法好好干”的比例达到 64.71%，要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流动类型的骑手比例（48.12%~52.16%）。

本文也发现，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流动类型和收入的关系会因户籍背景不同而略有不同。在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青年外卖骑手中，都是工作地域向上流动的骑手平均月收入最高（农业户籍为 5952.83 元，非农户籍为 5959.39 元），而没有流动的骑手平均月收入最低（农业户籍为 4883.88 元，非农户籍为 4713.82 元）。但在农业户籍骑手中，地域平行流动（5023.35 元）和向下流动（5066.27 元）的骑手之间的平均月收入几乎没有差别，而在非农户籍骑手中，地域平行流动骑手平均月收入为 4924.36 元，但从资源可能更好的家乡所属城市向下流动到其他城市的骑手，其收入则接近向上流动的骑手，达到了 5818.18 元。非农户籍骑手向下流动时更可能是基于适合的规划，因而收入更高，但在农业户籍骑手中这种情况较少。

最后，为综合比较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类型与其收入的相互关系，本研究以平均月收入为因变量，以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代内的职业流动和城市流动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中职业流动以首次就业成为骑手为参照类，城市流动以在家乡所属城市工作而未流动作为参照类。为了排除人口学变量和平均每日工作时长对月收入的影响，笔者将相关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如表 2 所示。在考虑到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之后，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与青年外卖骑手的月收入没有明显关联。和首次就业成为骑手相比，因失业或下岗而从事骑手的月收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但从其他职业转行为骑手的人月收入会更高。与在自己家乡所属城市工作而没有流动的骑手相比，无论是到更大的城市还是到更小的城市，地域流动的骑手月收入都会更高，从回归系数看，向上流动的骑手月收入增多更明显。

表 2 社会流动对青年外卖骑手月收入的影响

变量	平均月收入标准化回归系数
年龄	0.040 ^{**}
性别	-0.105 ^{***}
受教育程度	0.048 ^{**}
平均每日工作时长	0.060 ^{***}
代际间的教育流动	0.014
失业或下岗—骑手	-0.008
其他职业—骑手	0.047 [*]
城市向下流动	0.032 [*]
城市平行流动	0.039 ^{**}
城市向上流动	0.191 ^{***}

注：***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四) 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感知与发展信心

本研究用青年外卖骑手对社会流动强弱的感知来衡量其对自己未来社会阶层上升空间的感知。比较青年外卖骑手对自己五年后和当前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发现, 49.50% 的受访对象对社会流动性持有积极预期, 认为自己五年后的社会阶层会有所提升; 42.06% 的受访对象认为自己的阶层五年内不会有变化; 还有 8.44% 的受访对象认为自己的阶层未来会下降。换言之, 半数受访骑手相信社会阶层有向上流动的空间, 半数受访骑手认为社会阶层流动性比较弱, 甚至会向下流动。对比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的青年外卖骑手社会流动感知的差异发现, 户籍和受教育程度与青年外卖骑手社会流动感知没有明显关联, 但不同年龄骑手的社会流动感知存在差异 (卡方值 $\chi^2 = 23.725$, $p < 0.001$), 越年轻的骑手对阶层向上流动越有信心, “70 后” 认为自己五年后阶层会提升的比例为 44.20%, “80 后” 的比例为 47.82%, “90 后” 的比例为 51.01%, “00 后” 的比例为 53.13%。^①

本研究分析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感知与其职业发展信心之间的关联, 从收入增加和就业稳定来衡量青年外卖骑手对当前职业的发展信心, 分别比较社会流动感知不同的骑手对收入提高可能性的信心、对随年龄增长被取代的担心和对半年内职业稳定性的感知。整体上, 青年外卖骑手的职业发展信心不强。具体而言, 他们对自己收入会大幅度提高的信心不大, 只有平均 26.84% 的受访骑手对此有信心。但在那些对阶层向上流动有信心的受访骑手中, 这一比例达到 29.61%, 认为自己阶层可能向下流动的受访骑手这一比例为 22.75% (卡方值 $\chi^2 = 24.161$, $p < 0.001$)。平均 80.26% 的受访骑手担心随着年龄增长会被取代, 但有阶层向上流动感知的受访骑手这一比例是 77.21%, 低于阶层会向下流动感知的受访骑手 (84.32%) 和阶层不会变化的受访骑手 (83.04%) (卡方值 $\chi^2 = 36.171$, $p < 0.001$)。平均 49.52% 的受访骑手认为自己未来 6 个月内有可能失业, 阶层向上流动感知的受访骑手这一比例为 46.85%, 阶层向下流动感知的受访骑手这一比例为 55.83% (卡方值 $\chi^2 = 20.670$, $p < 0.001$)。可见, 能够感知到社会阶层具有向上流动空间时, 青年外卖骑手对职业发展的信心会更强, 更相信未来收入会增加, 更少担心职业不稳定或因年龄增长而失业。

本研究分别以青年外卖骑手的职业发展信心的几个指标为因变量, 以其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为参照类) 为自变量, 以人口学变量和户籍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3), 在考虑到人口学变量和户籍

① 以社会阶层流动差值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与此一致, 只有年龄与阶层流动预期显著相关。为让结果呈现更清晰, 此处只列出交叉列联表分析的频次差异检验结果。

等因素的影响后,与预期自己社会阶层会向下流动的受访骑手相比,预期自己社会阶层会提升的受访骑手越有信心其收入会提高,越少认为自己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被取代或可能失业。

表 3 社会流动感知对青年外卖骑手职业信心的影响

变量	收入可能大幅度提高 标准化回归系数	随年龄增长被取代 标准化回归系数	6 个月内可能失业 标准化回归系数
年龄	-0.028 [*]	0.084 ^{***}	0.040 ^{**}
性别	0.021	-0.050 ^{***}	-0.050 ^{***}
受教育程度	0.036 ^{**}	-0.025	-0.026 [*]
户籍	-0.009	-0.003	-0.023
阶层流动预期未流动	-0.029	0.015	-0.049 [*]
阶层流动预期向上流动	0.067 ^{**}	-0.069 ^{**}	-0.097 ^{***}

注: ***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本研究以城市归属感和在城市中与他人社会地位的比较来衡量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认同,分别比较社会流动感知不同的骑手在城市归属感和社会地位比较上的特点,由于骑手的城市认同还与其地域流动性有关,因此分析其在家乡所属城市工作和离开家乡工作的情况。从地域流动看,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在家乡所属的城市工作会影响其城市归属感和社会比较,流动到家乡之外城市工作的骑手平均有 51.67% 的人对工作城市没有归属感,53.25% 的人认为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要比别人低;而在家乡工作的骑手有 26.80% 的人认为没有归属感,40.28% 的人认为自己地位低人一等。但无论青年外卖骑手在地域上如何流动,当他们对阶层上升流动有信心时,都更有可能对当前所在城市形成归属感,做出积极的社会比较,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具体而言,在家乡所属城市工作且持有阶层上升预期的青年外卖骑手中,有 19.54% 的人城市归属感低,33.54% 的人做出消极的社会比较、认为自己比别人地位低,这两个概率都远低于认为阶层不变的比例(分别为 36.40% 和 48.00%)或认为阶层会下降的比例(分别为 24.62% 和 44.22%)的骑手。在外地城市工作且认为阶层流动方向会上升的青年外卖骑手中,有 43.76% 的人城市归属感低,44.98% 的人社会比较呈现消极,而这两个概率也都低于认为阶层不变的比例(分别为 59.40% 和 60.83%)或认为阶层下降的比例(分别为 57.41% 和 61.73%)的骑手。

笔者以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归属感和社会比较为因变量,以其社会流动感知(向下流动为参照类)为自变量,以人口学变量和户籍作为控制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与预期自己社会阶层会向下流动的相比，预期自己社会阶层会提升的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归属感更强，也更少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不如别人，而认为阶层不流动的青年外卖骑手的城市归属感会更弱。

表4 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流动感知对其城市认同的影响

变量	不属于这个城市 标准化回归系数	地位比别人低 标准化回归系数
年龄	0.020	0.032 [*]
性别	-0.057 ^{***}	-0.088 ^{***}
受教育程度	-0.060 ^{***}	-0.079 ^{***}
户籍	-0.039 ^{**}	-0.002
阶层流动预期未流动	0.075 ^{***}	0.031
阶层流动预期向上流动	-0.103 ^{***}	-0.134 ^{***}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

五、结论和讨论

（一）社会流动营造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

当社会充满流动活力的时候，劳动者在不同地域和职业之间流动的限制较少，可以更自由选择适合的职业。本研究通过对青年外卖骑手的分析发现，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灵活性让从业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创造更多财富。

具体而言，青年外卖骑手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以向上流动和平行流动为主，并且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骑手之间的教育流动方向相差不大，但因农业户籍骑手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虽然代际间教育向上流动比例一致，农业户籍骑手的受教育水平还是低于非农户籍骑手。在职业流动方面，超过八成的青年外卖骑手是从其他行业转为骑手职业的。如前所述，骑手行业收入较高、门槛低、灵活性强，因而成为很多人职业类型流动的一个选择，也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社会流动灵活的体现。在城市流动方面，超过六成的青年外卖骑手离开了家乡所属城市到其他城市工作，流动方向首先以一般地级市之间的平行流动为主，其次是向上流动到省会城市、一线城市和直辖市。

青年外卖骑手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与其收入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如果他

们的职业有流动经历,或是经历了城市流动,特别是在城市向上流动的时候,其收入会明显增高。对于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青年外卖骑手来说,流动都与收入的提升相关。

在城镇化过程中,外卖骑手作为新型职业成为很多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的新职业选择。以往研究显示,骑手群体的社会流动在地域上呈现机会多、距离短的“地铁模式”,在职业阶层上表现出向上流动的趋势。^① 本研究发现,外卖骑手还为很多农业户籍青年创造了非农就业的机会,也为失业或下岗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强了职业类型流动的便利性。这些流动经验也为从业者的工作累积了相应的经验,在从事相同的职业时,比如骑手职业,地域和职业上的灵活流动给从业者带来了收入增加的机会。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借助行业规模的扩张,现阶段青年外卖骑手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很多传统行业从业者(如一般的服务性行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和农、林、牧、渔行业从业者),并且职业群体内部的收入分布相对均衡;同时,青年外卖骑手也是农民工里收入较高的职业群体。但是,骑手职业也具有福利保障不完善、工作强度较高、就业脆弱性较强等问题,^② 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可能面临生活压力大、社会保障缺失等生活成本增加的困扰。因而,收入增加不代表生活的必然富裕。此外,有研究显示当大部分劳动力都能比较容易地流入某一令人满意的行业,而离开让人不太满意的行业,那么前一行行业的收入可能会降低,而后一行行业的收入可能会提升,在某个节点,行业间的收入会达到一个平衡点。^③ 因而,从长远看,职业间的流动也不代表个体收入的必然增加。但是,职业间流动的灵活性还是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多流向高收入行业的机会,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营造更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

(二) 社会流动感知: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社会心态基础

社会的流动活力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社会流动上,更是通过对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来影响人们的心态。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流动感知会影响青年外卖骑手的发展信心和城市融入。

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感知上,本研究中的受访青年外卖骑手近半数人持有积极感知,相信社会阶层具有向上流动的空间,认为自己五年后的社会阶

① 参见高文珺《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0~108页。

② 参见朱迪《新业态群体的成长与共同富裕》,《学海》2022年第1期,第60~72页;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

③ 参见Alvaro Montenegro, Labor Mobility, Job Preferenc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ur*, Vol. 17 (1), 2010, pp. 93-102.

层和现在相比会有所提高。四成青年外卖骑手认为自己的社会阶层不会有变化，还有少部分青年外卖骑手认为未来自己的阶层会向下流动。这一阶层流动的感知影响了青年外卖骑手对自己职业发展的信心和城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认为阶层有向上流动空间的骑手，与认为阶层不流动或向下流动的骑手相比，对自己未来收入增长更有信心，也更少担心就业不稳定或因年龄大而被取代，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强，而且，感知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骑手还会有更为积极的社会比较，更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别人。

本研究发现高社会流动感知会增强青年外卖骑手对职业发展的信心和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其积极的社会认同。一方面，这些积极的心态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生活的体现，有助于形成精神富足；另一方面，归属感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发展信心会激发人们奋斗的热情，提高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助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共建格局。

（三）社会流动与共同富裕

本研究通过对青年外卖骑手的分析发现，骑手具有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灵活性，这种流动为其提供了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特别是从事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收入有所增加。而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信心则让青年外卖骑手的社会心态更为积极，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预期更为乐观，城市融入程度更高，与他人的社会比较也更为积极，这种积极心态将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地为未来而努力。这些流动构成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基础和心态基础。因此，增加社会流动不仅有助于从优化市场机制下的收入获得上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还能通过提高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感知，培育人们形成更为乐观、和平、向上的积极社会心态，乐于为更好的未来奋斗。今后，可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推进教育深化和均衡发展等方面促进社会流动，让民众在社会身份、职业、受教育水平、发展地域等各方面都有灵活的向上流动空间，由此提高人们的社会流动感知，塑造积极的社会心态。

（责任编辑：温莹莹）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reby drew a visual knowledge graph.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key scope. Moreover, it clarifies the general context,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researc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earch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age, which has formed five key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stud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These categories focus on three levels: Marxism and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likely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uture will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w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and social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ssence of socialism; knowledge graph

Social Mobil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Taking Young Delivery Workers as an Example

Gao Wenjun

【Abstract】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is one of the way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study takes young delivery worker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actual social mobility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can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and mentality. The data of 6196 young delivery workers from “Chinese New Occupational Youths Surve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young delivery workers have experience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intra-generational career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the latter two have increased their income.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bout the likelihood to move up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s enhances young delivery workers’ confidence in career development,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ity and positive social status identification. Therefore,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in many ways and creating a social environment with upward mobility for young people will help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rom both aspects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mentality.

【Keywords】 young delivery workers; social mobility; common prosperity